

天涯异草

阿波里奈尔逝世100周年：

以天真目光扫视世界凶险的烟火

□沈大力

今岁是德彪西和阿波里奈尔两人逝世100周年，他们在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墓碑前又新添了纪念的鲜花。阿波里奈尔是个私生子，父亲为意大利军官，遗弃了波兰贵族女安妮卡·科斯特罗维茨基，致使母子二人流落法国。阿波里奈尔患西班牙流感死去，出殡那天恰逢一战结束，灵车过街时周围群众高呼：“打倒威廉！”不巧，阿波里奈尔的名字正是德语中的“威廉”，客观上让人感到公众的怒气是直冲着他发出的。他生时自怨自艾，声音自己是“最不可爱的人”，辞世时无端成了一个“倒霉鬼”。

笔者1979年夏曾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阿波里奈尔坟前的诗碑驻足，发现他被追认为“二十世纪最可爱的诗人”，身后的仰慕者不在少数，遂将其名诗《米拉波桥》译成汉语：

米拉波桥下流着塞纳河，
宛若我们爱的逝波。
旧情已成追忆，
犹记那确定的欢乐。

这是一首失恋诗。当年，桃花运高照的毕加索见好友阿波里奈尔形单影只，难得淑女芳心，特地为他介绍了女画家玛丽·罗朗珊。哪知，罗朗珊经诗人吹捧成名，画了一幅自己跟阿波里奈尔和毕加索的色粉“合影”后，绝情与其分手，嫁给了一个德国画家，让阿氏倍感失恋的痛楚：

光阴荏苒，
一去不复返，
爱情从此失落，
恰似这桥下的塞纳河。

这不是阿波里奈尔第一次失恋。1902年，他在莱茵河为英国女子安妮·普莱顿所倾倒，向伊求爱，迫其登上河畔悬崖，以死相逼。安妮退避伦敦，不料“情种”阿波里奈尔紧随而至，吓得女郎远遁大洋彼岸方得脱身。据此，他写下名诗《失恋谣》，坦露自己对安妮痴狂的爱和失恋后心灵遭受的莫大打击。全诗浸润“莱茵河的传说”，充盈作者失去莱茵河仙女而为之形神涣散的情态，节奏旋律极富音乐质感，得以传诵一时。1914年，阿波里奈尔在“天蓝海岸”的尼斯跟鲁薇丝·德·戈里尼一沙蒂荣相遇，又一遭坠入情网。抱憾很快无果而终，但诗人再度获得了一个寄托情思的意象“鲁”；尔后其诗作里不时显现的“Lou”，即是这位鲁薇丝留给他的永恒“缪斯”，有《献给鲁的组诗》为凭，真可谓“情场失意，诗字得意”。

后来，阿波里奈尔跟玛德莱娜·帕热斯订婚，两人通信“有如回忆一般柔情似水”，但他最终娶的妻子并非此女，而是在他病中的看护雅克丽娜·科尔贝，用他的话说，是一个“红棕色头发的漂亮姐儿”，出现在他最后一部作品《画诗》的尾章里。二人的婚礼于1918年5月2日举行，毕加索在场当证婚人。不幸的是，这位东床快婿突然患上

了西班牙流感，婚后刚过六个月就驾鹤仙逝了。

法国对阿波里奈尔的研究中有一项，就是他单恋几个女性在其诗歌创作里的反映。或许，他在《心扉篇》里拼凑尖端朝下的“火焰心”，正显示了事态的发展总与诗人“把生命献给爱”的求索相反。这里尚需特别提及的，还有阿波里奈尔跟法西共和国的象征玛丽亚娜的一段恶姻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阿波里奈尔确曾是“一个最不可爱的人”。岂止不可爱，他被当成了一个盗窃文物的罪犯。1911年8月26日，巴黎卢浮宫突然发生“蒙娜丽莎失窃案”，有偷窃嫌疑的吉里·彼埃莱向警方招供，提供了线索。先前，阿波里奈尔和毕加索二人与他有过交易，从吉里·彼埃莱手中购得两件后者从卢浮宫偷出来的钙质小雕像。此时，法国警方根据吉里·彼埃莱的口供，怀疑阿波里奈尔同毕加索一起在幕后操纵，“绑架”了《蒙娜丽莎》，遂将阿氏逮捕，关进桑岱监狱审讯，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消息通过报界在全巴黎传开，阿波里奈尔一时间成了与毕加索齐名的“名人”，轰动京城。不过，阿波里奈尔颇有哥们儿义气，丝毫没牵扯毕加索，后者得以“漏网”，未受牢狱之苦。两年后，《蒙娜丽莎》失窃案真相大白，原来是卢浮宫内一个意大利籍工人“监守自盗”，阿波里奈尔最后洗清了不白之冤。

更早些时候的1899年，阿波里奈尔在比利时瓦隆斯塔维洛一家旅馆住宿欠费，带着弟弟乘人不备逃到巴黎混日子十来年。一战刚开始，法国为补充兵源，于1914年8月5日颁布一项外国人自动入籍的法令，规定只要应召入伍上前线，立即可以成为法兰西公民。阿波里奈尔闻之赶紧递上申请书，悟到加入法国的外籍军团乃是他这类落难者入籍的一条捷径。他表示说：“敝人从孩提时就住在法国，1899年申报为‘外籍’。自那时以来，为本在文学界小有名气，一直渴求伟大而高尚的法兰西民族给我荣誉，将不才接纳为自己人。”这封“求爱书”感情炽烈，正像他在宝塔体《画诗》的《心扉篇》里用文字排列出一个“心似火焰”的图形，象征他赤诚的胸怀。

不料，法国行政当局对这个“来路不明”的“波兰杂种”持怀疑态度，根本不他的“爱国热忱”所动，完全不理睬其申请。直至需要他的部队上级积极干预，阿波里奈尔才于1916年3月8日获准入籍，正式成了“法国人”。阿波里奈尔比难弟毕加索幸运，后者在法国终生未能入籍，《拉罗斯辞典》将他列为“西班牙画家”。可惜，阿氏命运多舛，得福祸依，刚当上法陆军第96兵团少尉一个多月，就于当月在前线战壕里醉心阅读时，太阳穴中弹，紧急接受颅骨环钻手术，复员干后勤，在所剩无几的余年继续为法兰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法国当局还是确定他的早逝与其在前线受重伤有关系，称他因“患西

班牙流感为法国捐躯”。何况，他毕竟已入法国籍，故而享受特殊优待，其著作在伽里玛出版社的版权保护期，比传统的长了将近30年，延至今岁他的逝世百年纪念为止，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70年限制。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承认：“从今以后，杰出诗人的作品进入了我们文化遗产的共同宝库”，让一位意大利血统的“失恋诗人”能够在法国巴黎拉雪兹神甫公墓里入土为安。

究《画诗》的图形结构。然而，对他在20世纪欧洲新文艺思潮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尚需更全面的深入探求。

值此阿波里奈尔逝世百年之际，巴黎新索邦大学和列日大学联合组织国际论坛，力求通过新文献的推敲，



阿波里奈尔与友人图 罗朗珊 作

2016年4月至7月，巴黎橘园博物馆曾举办《诗人的目光》展览，向观众呈现一个多视角的阿波里奈尔，在文学与艺术两方面俱有成就。50余年来，他的诗歌代表作《饮酒集》进入中学课本，让孩子们背诵《米拉波桥》脍炙人口的名篇，领略一位“语言音乐家”的空灵奇妙。大学里不断研

开辟对这位文苑奇秀研究的蹊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宝塔体《画诗》在画境与诗意融合上给现代诗学的启迪；二为对诗人生涯的综合审视，揭开其新文艺思考的多层面。这种考量基于一个往往被一般人忽略的事实，即阿波里奈尔不仅被公认为“一个现代特色的诗人”，而且在艺术哲学、美学领域有独特创见。他到巴黎后不久，便发表了《腐败的魔术师》一书。作为一个文艺记者，他在艺苑广交朋友，十分活跃，同追逐新潮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欧仁·蒙弗尔、安德烈·萨勒孟，以及其他象征派、或野兽派“弄潮儿”毕加索、德兰、马克斯·雅各布、弗拉曼克、夏加尔、凡·东庚、卢梭均有过从。阿波里奈尔鼓吹“新精神”、“新艺术”，在《不妥协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绘画评论，称凡·东庚的画为“鸦片



画诗：“鲁(的前)射穿了我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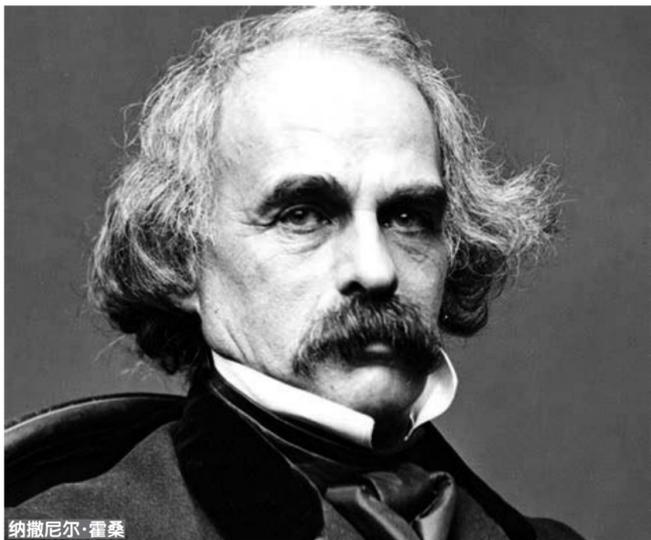
阿波里奈尔

烟”，称罗伯特·德洛内的作品为“俄耳甫斯教理”，尤其发表文论《美学沉思录》《立体派画家》，抛出“超现实主义”等新名词，为法国这一新流派释义，影响甚广。

阿波里奈尔还继圣佩韦之后，为萨德侯爵鸣不平，称这个被看成“色魔”的“恶之花”为“有史以来最自由的精神”，为超现实主义运动找到了“神主”。超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布勒东赞扬他“最大程度体现了智慧奇遇”。阿波里奈尔的“奇遇”表现在他勇于冲决文学艺术的窠臼，独创了《木钟回响》等几部轻喜剧。值得一提的还有先锋派剧作《蒂雷希娅的丰乳》，该剧于1917年5月在巴黎被搬上舞台，以“超现实”姿态震撼了20世纪初的欧陆剧坛。他同时涉足影坛，写过电影脚本《勃莱阿迪娜》，尤其是匿名发表了《一万一千荆棘》等情色小说，一般不被人提及，出版者近年来才敢署上作者的真实姓名。

阿波里奈尔在文苑“以奇制胜”，成了20世纪的“波德莱尔”。他喜欢搜集非洲等异邦原始艺术品，生前曾写信向友人亨利·马蒂斯坦承：“我的每首诗都是对平生一个事件的追忆”。或许，正是因这样接触实际，他的《饮酒集》才引起大众的共鸣。现时，人们在试图廓清阿波里奈尔留给后世的形象。且看，诗人在《画诗》中以自嘲的口吻归结了他如梦的“荒诞”生涯。他用天真的目光扫视世界凶险的烟火，貌似幼稚，内心却一腔梦破的酸楚。按他作品流露的绝望隐情，似乎可以到莫迪亚诺的“心酸酸”里跟一群“天涯沦落人”倾诉衷肠。事实上，阿波里奈尔鼓吹“现代主义”，却是一位叔本华式的悲观人物。他几番折腾也没能否定“生活意志”，日夕在塞纳河畔彷徨，终身失恋，如他自己所言，成了一个“两岸的游荡者”，最终魂归诗乡。

经典



纳撒尼尔·霍桑

众所周知，美国小说家霍桑以人物心理分析见长。他早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数取材于他在塞勒姆闭门苦读的档案典籍，而后期作品则更多取材于他的日常生活经验。比如小说《拉帕其尼的女儿》所描摹的拉帕其尼医生醉心于科学研究，尝试从植物中萃取毒素，结果亲手将女儿毒杀——这一故事的原型是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由于爱默生长期外出演讲访问，他的妻子孤独郁闷，只能靠调制毒酒自我麻醉。小说《玉石雕像》则以霍桑全家侨居意大利的经历为背景，书中温婉可人的女主人公希尔达无疑是他夫人索菲娅·皮博迪的化身。此外，小说《福谷传奇》中高谈阔论邦社会改造思想的男主人公暗指霍桑在康科德的邻居、哲学家奥尔科特；而书中才貌双全又多愁善感的女主人公齐诺比亚的原型，一般说法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十九世纪妇

女》的作者玛格丽特·富勒——尽管批评家言之凿凿，作家本人对此却矢口否认。100多年来，美国的霍桑学者及文学爱好者经过多方搜求考证，终于揭示霍桑后期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确实另有其人——此人便是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作家、莎士比亚学者迪莉亚·培根。

1856年7月28日，身为美国驻利物浦总领事的霍桑赴伦敦造访迪莉亚·培根。后者时年45岁，已在伦敦旅居3年，撰写关于莎剧作者考证的专著。霍桑此行乃是受到妻姐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再三敦促：自1849年由祖黑文迁居波士顿坎布里奇之后，培根小姐已成当地文界的名人。

培根小姐出身于祖黑文牧师之家，14岁辍学，完全靠自学成才，15岁起在女子学校担任历史教师。1831年，即她20岁那年，匿名出版《清教徒的故事》，由此初登文坛。1832年，击败爱伦·坡，获费城

迪莉亚·培根：“霍桑最后的女主人公”

□杨 靖

《星期六邮报》短篇小说奖。1839年，她的第一部剧作《爱德华要塞的新娘》出版，剧终前主人公呼喊出“自由万岁”的口号，相当提振人心，可惜该剧商演并不成功。1845年，培根小姐退隐乡间，潜心阅读和写作；她在阅读史料过程中获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擅长用密码写作，这一发现为她日后的考证提供了灵感。培根小姐热情活泼，智力超群，不乏迷人魅力，原本可以在当地社交界大显身手，可惜成名不久便身陷丑闻：1847年，她的哥哥、身为公理教师师的莱昂纳德指控另一名牧师亚历山大·麦克沃特“品行不端”——在短暂的订婚之后，他对培根小姐乱终弃——教会听证会裁决的结果：麦克沃特的行径固然应受谴责，但培根小姐行为不检招致物议，亦可谓咎由自取。

在纽黑文(耶鲁)颜面扫地的培根小姐到了波士顿却广受赞誉：她的不幸遭遇引发了坎布里奇(哈佛)自由派文人尤其是妇女界的广泛同情。像她的同时代妇女先驱玛格丽特·富勒一样，培根小姐以谈话课堂的形式谋生——话题多为历史类讨论，对象则多为波士顿上层阶层妇女。1848年，跟富勒一样，她由波士顿迁居纽约，谈话课堂在纽约仍大获成功——听众规模多达百余人，其中不乏将军、法官、教授夫人和小姐——著名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比彻夫人称之为“美国女性所受的最高礼遇”；另一位著名作家达尔夫人则推崇她为“阿波罗的女祭司”。

培根小姐言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并非“目不识丁的屠夫之子”的威廉·莎士比亚，而是集体创作。她认为莎士比亚戏剧事实上是培根未完成的巨著《伟大的复兴》缺失的第四部分——该部分也并非培根独立完成，而是由以文

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伊丽莎白女王宠臣罗利爵士、大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以及牛津伯爵等人构成的小团体合力完成——“他们是一班失意的政客，由于反对女王和政府被逐出政坛……被驱逐逐出一个领域，他们在暗中反抗”。他们之所以不愿签署真名，并非如人们想象的由于廷臣创作戏剧有失身份，乃是由于该社团在剧作文本中暗植了反女王专制主义的共和思想(培根小姐本人师从莫尔斯，堪称密码专家)。而她的使命便是排除险阻，向世人揭示这一真相。作为一名曾经的历史教师，培根小姐坚信文学(尤其是历史剧)的功能不仅在于娱乐民众，更在于教化民众——她本人曾以莎士比亚体创作有关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剧，以社会精英的口吻向普通民众传布爱国主义思想。

以廷臣为主体的共和主义者通过戏剧向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民灌输反君主专制的思想，这一大胆立论在19世纪中期的新英格兰可谓惊世骇俗。正统人士普遍相信美国共和传统植根于殖民地的加尔文清教主义，而培根小姐居然宣称共和跟民主自由以及三权分立一样都是欧洲大陆的舶来品，可谓是对学院派津津乐道的“美国例外论”的致命一击。

“康科德圣人”爱默生一开始是培根小姐的热情支持者和捍卫者——“近十年来，”他不无骄傲地宣称，他在美国发现了“两位具有原创力的天才”——另一位是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然而当培根小姐始终无法提供证据回应公众质疑，并且观点日益走向激进时，爱默生开始动摇和退却。他对培根小姐呈送的手稿态度冷漠(并在“无意”中弄丢三

份手稿)，甚至暗自怀疑她发了疯——1856年1月，培根小姐在《普纳姆》杂志发表公开抨击莎士比亚的长篇大论——爱默生大受惊吓。受到读者的强烈反对，该杂志被迫将计划刊登的培根小姐系列论文全部撤除。

由于在美国学界遭到打压，受纽约银行家巴特勒资助，培根小姐愤而出走英国——为搜集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她的假说——通过对三部莎剧《李尔王》《泰利斯·凯撒》和《科瑞奥兰纳斯》的细读，她对剧作中的政治隐喻和密码逐一进行破解，并自认为即使缺乏实物佐证，这一论断也确凿无疑。然而，令她悲伤绝望的是，在莎士比亚的故乡，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样，人们对于天才的崇拜之情压倒一切。根本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胆敢)出版她的研究“发现”。

1856年，当以作品《红字》蜚声大洋两岸的作家霍桑与培根小姐晤面时，后者贫病交加，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霍桑兴趣盎然地阅读了手稿，他的妻子索菲娅也认为作为著作“非常精彩”，于是霍桑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出面代作者四处奔走洽谈，并允诺为本书撰写出版序言。次年，厚达700余页的著作以《隐秘的莎剧哲学》为名在伦敦和波士顿两地同时出版。该书融宗教、科学、政治于一炉(培根对《李尔王》等剧作的解读采用了新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方法，认为三部剧中皆有“恶君”形象)，并大胆揭示专制是退步，共和才是历史进步的真理，在学术界产生相当影响。

书籍出版后，培根小姐倍受鼓舞，决定只身前往斯特拉福德，试图在莎士比亚墓地有所斩获，发现秘密社团埋藏的证物。她的这一次历险，在霍桑随笔“追忆一位天才女性”(论文发表在《大

西洋月刊》，后收入随笔集《我们的老屋》)中被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培根小姐坚持认为伊丽莎白时代哲学家的秘密档案就埋藏在莎士比亚墓穴之中。她成功地说服管理员同意她闭馆后继续留在墓室。她手持灯笼下到墓穴深处，而后待在那里一动不动，整整三个小时……培根小姐后来的解释是她当时面临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想不顾一切地开挖墓地，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违背自己的誓言(她向管理员发誓保证墓室完好无损)——最后她一无所获，只好黯然离开。

墓穴冒险无功而返，培根小姐极度沮丧：史上先贤哲人的英名被一位粗俗之人冒用，真相被掩埋在历史遗迹之中，她本人却无力揭穿。她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一位亲戚将她送往美国一所精神病院，两年后培根小姐去世。

霍桑与培根小姐的交友，一开始或许是受爱默生的刺激(在提携文学后进方面，二人长期存在某种相互竞争)，但后来小说家确乎从她身上(及其作品中)发现了某种特质：即对于新英格兰正统加尔文教的反叛——莎士比亚是大西洋两岸文学界的偶像，正如加尔文教(清教)在新英格兰的赫赫权威，而任何敢于挑战权威的角色(何况还是女性)无疑都会引发作家的激赏——将培根小姐这一形象融入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使之名垂青史，也就成了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挖掘出这一段史实之后，批评家普遍相信，在霍桑后期小说如《福谷传奇》《玉石雕像》以及随笔《英国笔记》等作品中，总不难在希尔达、齐诺比亚以及普莉希拉等人物身上发现培根小姐的身影。迪莉亚·培根堪称“霍桑最后的女主人公”。